

教育造就中国社会

——中国教育自身的道德教化意义

毕世响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福州, 350007)

摘要:中国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完整的教化体系,并不必然要把教育人为地分解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诸育。教育体系和社会体系互为表里,社会也是综合、完整的教化体系,教育精神和社会精神都是教化精神,教化是针对社会所有阶层的;相比较而言,当代教育,似乎把教育给割裂了,教育体系本身不但人为地肢解了,教育对象也从社会和国民缩小到了学校青少年,教育似乎正在失去它的道德精神——教化。如果非得用现代这种分析型教育体系理解教育的话,现代德育得恢复教育的整体道德教化精神。中国近代教育就是一场持续到当下的道德实践,教育造就了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也造就了教育。这才是社会意义上的道德教育。

关键词: 教化精神; 教育精神; 社会精神; 道德实践; 道德教育

前言

中国社会是一个综合社会(整体社会),又是一个教化社会,教育体系本身就是道德教育体系,并不在教育体系之外存在一个专门的道德教育,因为中国的教育就是教化。这个教化,是针对整个社会的,而不仅仅是针对社会的哪一个阶层。所以,“教化”是中国教育精神的一般概括,“教化”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的一般概括。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相互济润焦枯。又因为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于社会的文化,这个文化是包括教育在内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教育文化,教育就是社会,不是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的教育精神也是社会精神,文学精神也是社会精神,历史精神也是社会精神,科学精神也是社会精神。反过来,中国社会的社会精神也是教育精神,社会精神也是文学精神,社会精神也是历史精神,社会精神也是科学精神。中国自古就是政治与教育合一的精神传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社会越发生变化,越得在文化上寻求智慧,在这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坚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在根本上是知识分子的教育革命,政党只是知识分子教育精神的执行者,这样的实践当前还在进行之中,从而铸造出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在中国社会是高于一切的力量,教育实际上又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最终力量;相比较而言,西方社会是分析社会,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就像现代学科分类那样既烦琐又精细,而且泾渭分明,从而形成西方社会的分析教育哲学精神。中国从近代以来学习西方,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政治体制。西方社会当下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浓厚的兴趣,西方社会应该学习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因为中国社会不存在个人与社会对立的教育精神,也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任何一个领域的危机都会严重威胁社会与政府一类的问题,这是中国教育文化之中解决当代社会危机的一个大智慧。

政(治)教(育)合一的文化教育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碰到的最根本问题是国家体制,而国家体制的根本又是国家元首。中国的国家体制和元首自古就是“朕即国家”的王制,《诗经》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国家元首是天子（帝王），帝王一个人是不能躬亲天下一切事务的，于是便设置了宰相来帮助天子辅佐天下，这个制度，法良意美，为历史所肯定。帝王掌握着最高权力，帝王却并不能处理天下那么多实际的政务，那些实际的政务则由宰相来处理。这样一来，帝王和宰相之间既会和谐，又会龃龉，甚至二者为敌。实际上，宰相一个人也不能处理天下那么多实际的政务，所以，在宰相之下，又设置了处理实际政务的各个权力机构，如后代的吏、礼、户、兵、刑、工六部。这些权力机构和宰相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他们和宰相一起与帝王斡旋，宰相就是他们的领班。中国几千年历史，帝权和相权之间总在斗争，从权位上说，帝王占上风的时候为多，因为开国帝王总要制定一些抬高帝权、贬黜相权的制度条文，这样一来，从夏商周到宋元明清，帝权与相权之间的距离就绝远了。周天子时代，伊尹敢流放太甲，连那历史上声望绝高的周公都被成王怀疑，而民间知道周公的人远远超过知道成王的人，可见宰相之一斑。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还是觉得宰相权力对帝王权力始终是一个威胁，明朝最终废除了宰相制度，以阁臣和词臣团体来瓜分过去宰相一个人的权力与事务，后来成为这样的定制：阁臣必须是甲科出身，即必须是经过科举制度出来的进士。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文官制度：帝王有决策权，文官有话语权。而那些文官都是经过科举制度出来的读书人。吏、礼、户、兵、刑、工六部的官员，国家各个行当和各个层次的官员，皆以科举造就。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国家命运就和科举制度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或者反过来说，帝权也得架在科举制度之上。

科举制度既是独立的入仕制度，又是教育制度，因为教育培养人虽然并不必然入仕，入仕却是读书人的责任。中国自古就是政（治）教（育）合一的传统，教育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教育，教育从来就不仅仅是学校里面的勾当。中国文化在根本上是教育文化，中国的所有典籍都是教化文章，教育制度理当然是教化制度，教育培养人首先是干政。虽然科举制度使读书有沦为利禄之途的方便，或者说，科举制度本身成为读书人沦为利禄之徒的现实，然而，教育的光荣与高尚也体现在这里了，人的分野也在这里了。从教育本身来说，古代教育的概念不同于现代，古代政府不在一家一户的教育上下工夫，能够进入政府学校如太学、府学和县学浸淫的当然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想读书的人，多以私塾、书院、自学或者家学为教育形式，对个人来说，教育是个人的事情。

古代教育的某些意义在后代已经沦陷或者消失了，如教育的养老意义与教育的化民成俗意义不但式微，竟也像“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一般的飘渺了。教育已经从道德教化、培养道德君子转化为现代的培养知识劳工，道德已经不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现代教育似乎把培养人才作为自己最根本的意义，而人才实际上不能仅仅依靠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现在的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并不能都称为人才，至少在大学本科毕业生是不能用“人才”这样的称谓的，研究生更多的是专业化的，绝不是通才。

教育制度、社会制度与道德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于“革命”运动之中，这种革命的精神，除了中国文化固有的涵义以外，还有法国革命的狂热精神，欧洲革命的阶级精神，俄国革命的残酷精神。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文化”为根本，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如谜似梦幻一般的“文化大革命”。

与日本相比较，近代中国对待王制是批判的，是革命的，日本对待王制仍然是崇拜的：天皇万世一系。所以，日本的革命没有耗费在王制上，实际上也就是没有耗费在国家的根基上。日本的革命耗费在国家的维新上，如明治维新就是日本从旧王制走向新王制的成功。“在学术思想上，因有中国宋、明儒家以后王阳明理学的普及影响，化成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除了以西方的科学文明为用，仍以日本大和魂的民族文化精神为主。在国家士气方面，因有强横霸道武士道的传统，特别容易与军国主义结合，于是一变就成为‘大日如来’的帝

国主义侵略思想。”^①似乎可以认为，“政治上的天皇、思想上的中国理学、实用上的西方科学”，成为近代以来日本的“菊花与军刀”的大和民族精神。而日本的教育精神则是“日本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的革命却耗费在了国家的根基上，从清朝末年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国力都围绕着新旧王制做文章。譬如，北洋政府期间，政府像走马灯一般地变幻，真比孩童玩过家家那么儿戏。因为在根本上，中国的“家天下”的政治思想还在作怪。按照中国的老传统，本来王制是王家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本没有多少干系，因为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极其稳定的老传统，那就是，对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咱都是他的老百姓。这就为任何一个新王朝都省却了一番艰难的教育功夫：老百姓用不着特别的教育，自然而然地就是你的新民。而法国革命得费尽心计才能为新的政府教育出新的公民。朱熹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亲民”理解为“新民”，是很有教育道理的。老百姓虽然自古就是“老”百姓，却永远都是新王朝的“新”民。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却是千家万户的买卖，各种各样的主义与思想都由某种政治上的势力强行闯进了老百姓的门庭，改变着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教育，如今渐渐要变成中国普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了，教育在历史上根本就不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主体人格：帝王将相、士大夫与老百姓风云变幻起来。

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批判”与“打倒”几字真言上：批判帝制，批判旧文化，批判科举，打倒孔家店，打倒王权。新文化教育运动的精神就表现在几个批判事件上：废科举、剪辫子、放小脚、黜帝制。五四被西洋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它的功劳非常大——罪过也一样大。它奠定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批判运动。当人们说起文化大革命来，总想起它的批判狂潮，实际上，这个狂潮的始作俑者就是五四诸文化君子。

一百年来，中国文化之中受到非难最多的可能就是科举取士制度了，废除科举制度、剪掉辫子、放开小脚为天足，几乎成为新文化教育运动的标志，甚至成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精神。当时和后来的文化人曾经自豪地说：我们一夜之间，废除了千年科举制度，剪掉了几百年的辫子，放开了几百年的小脚为天足，我们取得了文化的胜利，得到了解放。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似乎发现，在教育上，又走到了一百年前，我们不但没有得到解放，似乎还在原地踏步：高考制度就是现代科举制度。我们对科举制度批判了一百年，即使在 2006 年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周年之际，却没有一个象样的“百年祭”仪式——中国文化人本来最喜欢写“一年祭”、“三年祭”、“五年祭”、“十年祭”、“二十年祭”、“百年祭”、“两百年祭”、“千年祭”一类的文章，不写这样的文字，文化人干什么呢？文化人靠什么吃饭呢？实际上，在一百年前废除科举的诏命下达之际，当时也没有引起朝野的波澜。

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是相当浓厚的，从古代的科举制度到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中国研究中的显学。国内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不仅仅是教育本身，中国社会是铁板一块，即：中国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的一切领域或者行当都喜欢补充、相互牵制，个人与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个人忍让社会，任何一个领域或者行当的危机都不足以动摇社会的根基。中国社会就像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一样，文史哲是通的，文学家就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同样，史学家也是文学家，也是哲学家，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中国社会的教育精神也是社会精神，文学精神也是社会精神，历史精神也是社会精神，科学精神也是社会精神。反过来说，中国社会的社会精神也是教育精神，社会精神也是文学精神，社会精神也是历史精神，社会精神也是科学精神——其致命缺陷在于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相互推委，思维不精细，产生独裁；而西方社会像近代以来的学科分类，文史哲是有严格的界限的，文只是文，

^①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27 页。

不是史，更不是哲；史就是史，不是文，不是哲；哲就是哲，不是文，不是史。理科、工科、人文社会学科泾渭分明，并且几乎各自为政。西方社会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精神被人为地划分为繁琐的领域，个人不忍让社会，更不忍让政府，社会各个领域和精神往往相互龃龉——其巨大功劳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相互牵制，不容易出现独裁。西方社会衡量社会的指标非常多，每个专业领域都有自己的指标，任何一个指标出现危机，都会威胁政府的执政。中国社会不存在西方社会的社会危机指标威胁政府一类的问题，这种大思维和文化教育立场，应该是解决当代社会危机的一个智慧。这才是西方社会研究中国文化的根本。

运动与思想：近代教育制度的道德实践

一百年前的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以来与国际的接轨，它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五四”运动成为其思想高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教育思想文化传统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了最严重的批判，中国的落后被归于传统思想文化的腐朽。既然传统思想文化不再能够作为指导哲学，那么用什么来接续呢？“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激进派则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从此，“西学”进入中国，中国文化又一次融合西方文化。西汉末年，印度佛学进入中国，是中外文化的第一次融合，形成后来中国本土化的佛学，是佛学的中国化；而西学进入中国，在形式上更是中学的西学化。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高潮，改变了中国的格局。教育内容除了传统的经学（国学）外，西学成为代表现代文明的内容。西学，清末以来，凡欧美传来之学，包括自然科学、经济、社会、政治等学说，都统称西学，主要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概念与内容，最后形成古今东西文化的交汇。

从清朝末年到建国，教育运动经历了若干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演绎：

洋务教育思想——务采西学，改革科举，建立新学，中体西用，留学教育，科学教育思想和制度。

改良教育思想——教育为本，引进西政与西体，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制度如“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辛亥革命教育思想——革命而非改良的教育主张，建立新式学校，刊行革命读物，确立民国教育方针，公布“壬子癸丑学制”。

复古教育思想——孔教会，尊孔，读经，忠孝节义，智识技能，道德实利尚武教育为体，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五四”新文化教育思想——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白话文运动，新文化启蒙，学生爱国主义运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以美育代宗教，反传统，打倒孔家店。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教育思想——义和团运动和捻军虽然不是教育运动，却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如反对洋教洋学堂，这是民族教育思想的民间逻辑。

农民教育运动——在中国革命的早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着手于农民运动，那是对国民的教育，是“唤醒民众”的教育精神。那样的精神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是社会教育”的教育形式。作为对比，“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教育”，“中国当代教育是学校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根本形式。

生活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活动。“社会即学校”的思想在毛泽东时代有了政治性的大发挥，形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也是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时代接续。

乡村建设运动和平民教育运动——以晏阳初为首的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区，梁漱溟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俞庆棠等人的江苏无锡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后改称江苏教育学院），由此渐成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大中心。

民众教育——国民政府的制定了“民众教育馆”制度，在各个地方（最基层到乡镇）成立民众教育馆。如江苏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制定的民众教育施教原则为：自教教人，自养养人，自卫卫人。使命是：“唤起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使民众自教、自养、自卫。即“从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三种教育方式去促进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之实现”，以达到“实施生计指导，以救济徐海农村，发展徐海地区的生产力；实施公民训练，以促进徐海农村的组织；实施语文教学，以提高徐海农村的文化水平。”^①

大学教育系的教育学体系——在大学的教育系，教育学者更多的是以西方的教育学为教材，如赫尔巴特教育学，夸美纽斯教育学，杜威教育学等。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体系——1927年的土地革命、瑞金政府、井冈山时期、陕北根据地等教育实践。其中心思想是：文化教育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这也是建国后教育思想的根本。

日伪时期的教育——多种政权和教育文化的混合。在日本占领期间，一个地方往往有几个政权存在：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政权，每个政权都有自己的教育体系。

传统教育——私塾和改良私塾，以传统文化如《四书》《五经》为教育，以学田、家族和守旧绅士为教育之支撑。

教会教育——西洋文化和教育在中国的传播。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其中的一个特殊因素，也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一个主动“外遇”和被动“外遇”，使中国文化教育有了一个新血统。

留洋教育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到外国接受教育以后，把外国教育、文化、思想、科技、制度等等揉合在中国的土地上。实际上是中外教育思想的杂糅。

杜威等西方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遇合——西方教育家杜威、克伯屈等不但在中国有弟子，而且亲自来中国，传播他们的教育思想，进行他们的教育实验。其中以杜威为尤。似乎这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更多的在大中城市和知识分子身上影响更大一些，而在广大乡村仍然是传统的教育思想在起作用。

毛泽东时代教育制度：社会教育与培养普通劳动者

建国后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运动，实际上仍然是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补充的教育制度，因为实行的是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即所谓的“两条腿走路”，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是一回事，这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除了全日制学校外，各类半耕(工)半读的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在中国社会。在“两种教育制度”推行过程中，全日制小学、简易小学、耕读小学同步发展，特别是耕读小学的举办，使很多适龄儿童获得读书的机会，是今天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先声。

这个时代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特色是针对老百姓的教育，其典型是建国初全国性的扫盲运动。能够识字读书是老百姓普遍获得解放的一个真切感受——因为中国老百姓几千年都不以识字为生活方式，新中国给了老百姓一个新的荣耀与高尚。而扫盲教育是对民国平民教育运动的时代接续，所用的教育制度如教材、教学方法都是过去平民教育运动（如平民识字运动）的套路。

^①曹良质，《赵光涛的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实践》，《徐州文史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徐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16辑，1996年10月。

高等教育却走向了另外一个不归路：1952 年院系调整（实际上，整个 1950 年代都在调整，并不仅仅是 1952 年），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即把在民国形成的大学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改造，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专业化”或者叫“高等教育学院化”的高等教育范式。“高等教育专业化”或者“高等教育学院化”就是把旧大学的一个一个学院和专业独立出来，再把其它学校的一些老师和专业调整过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如南京师范学院（即今日的南京师范大学）^[1]，南京工学院（即今日的东南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日的河海大学），南京农学院（即今日的南京农林大学）等，他们本来都是原来的南京大学或者早期的东南大学的一个学院或者一个专业。同时保留经过改造的综合性大学如南京大学。当时，江苏省的文科力量集中在南京师范学院，理科力量集中在南京大学。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典范；这些学院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都改变了“学院”名号，以“大学”自居了，如南京师范学院即今日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工学院即今日的东南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日的河海大学，南京农学院即今日的南京农业大学等。实际上是企图回复到他们当年的身份。在本质上，现在的整个教育实际上企图回复到过去的老路上去；高等学校闹合并，甚至在异地设立分校，形成文化教育托拉斯式，使高等学校的崇高性和学术尊严已经所剩无几，真正斯文扫地，换来的是没有尊严、甚至没有社会责任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堕落才是中国今天教育最严重的问题。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大致有以下几个教育思想：

1. 以老解放区教育思想为教育之根本：文化教育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2. 苏联教育思想，主要是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教育学的巨大影响，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教育学体系都是凯洛夫体系。凯洛夫“五个教学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至今仍然是中小学教学的基本范式。苏联其他教育家如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在中国的巨大影响至今仍然深深地存在于中国的教育活动之中。他们对中国教育的作用，除了杜威以外，没有那个外国教育家可与比拟。

3. 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①“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国教育的根本。这是政（治）教（育）合一的典范。

这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培养人的根本：培养普通劳动者。教育是社会教育，而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这种培养人的途径和教育的涵义是不同于今天的，学校教育只是一个初步的培养，社会教育才是根本途径，所以，才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社会教育。极端者如：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要求各行各业都要以本行为主，兼学别样，“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②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运动在大方向上是教育和其它一切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用

^[1] 1952 年 7 月，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按照华东区的院系调整方案，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两校校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分别组织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和南京师范学院建校筹备委员会。南京师范学院以南京大学师范学院和金陵大学教育系、儿童福利等系科为基础与上海震旦大学托儿专修科、广州岭南大学社会福利系儿童福利组、南京师范专科学校数理班合并改建而成，院址设于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南京师范大学前身可溯源至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 1902 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后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1949 年 8 月，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http://www.njnu.edu.cn/xxgk>）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385 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下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0 页。

学术话语来说，实际上就是教育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建构。以“运动”教育的根本实践形式。毛泽东所发动的一切运动，实际上都是对这个人们的教育，所以，都可以理解为“教育运动”，那个教育是社会教育。是对民国教育家如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教育思想的政治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制度：学校教育与培养人才

改革开放到当下的教育，其特征大致有以下几个：

1. 教育从培养普通劳动者到培养人才

“1985年5月15—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27日正式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10稿）》，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提高现有的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这一教育方针，改变了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所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在这个《决定》中中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这是中国教育的新历史意义，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道德、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建设，到邓小平时代的人才观、素质观、国家发展观。

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2月13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轨道。’具体规定了90年代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素质，素质教育和人才的思想，成为中国教育的新方针。”

2. 教育的法制化

“后来，国家又通过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如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又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这是中国教育里程碑式的变化：法制化。”^②

3. 教育从社会教育演绎为学校教育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实际上是秉承民国社会教育运动的传统，而又在他老人家的雄才伟略下，把教育运动和国家命运一体化的实践。这样的智慧和德性境界不是一般的人能够达到的，因为那是一个哲学家兼政治家才能够胜任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矫正以前教育的弊病，最终把教育从广阔的社会天地缩窄到了学校门径里面。也就是，把教育培养人塑造为学校培养人的教育模式。可能现在的教育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教育是培养人才吗？或者，人才只由学校教育培养吗？

4. 教育的基本格局仍然是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格局

“中国教育在今天的体系和格局，并不是现在创造出来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具体实施的学生守则，教育机构，在‘一五’期间就形成了，甚至教育的一般格局，都是在以前形成的。”^①譬如，一个地方的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格局，都是按照

^②毕世响，《教育史诗独白——国民社会教育体系诉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259页-260页。

^①毕世响，《教育史诗独白——国民社会教育体系诉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278页。

以前的教育格局建立起来的：1978年6月6日国务院转批教育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即恢复高考；同年紧接着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修订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

无论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传统根本没有变化：政（治）教（育）合一。教育仍然是意识形态，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第三产业或者消费事业。

中国社会时下发生着质的变化，其意义不亚于新国家的成立，因为几千年来的农耕生活方式在这个时代经历着巨大的折磨，既要现代化，又要保持中国自己的文化教育意义。在历史上，儒学、佛教和科举制度使中国成为亚洲文化教育的宗主国，看来，中国的教育思想很可能要走回头路。既要回复古代的教育制度，又要回复民国的教育制度，还要回复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制度。

教育精神下的知识分子道德精神

教育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最紧密而微妙的关系，在根本上说，教育制度总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知识分子也是由教育造就出来的。至少知识分子要执掌教育的一半权力，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的士人，近代的教育制度造就的是知识分子。旧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思想，把知识分子和教育演绎为中国革命。不说清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不能说清楚中国教育的命运。

民国教育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一手造就出来的。

实际上，知识分子造就的还不仅仅是教育。

中国近代的路子是知识分子找出来的。

似乎是这样的事实：今天的文化教育，尚不能和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相提并论。“五四”成为知识分子的骄傲和羞愧，骄傲的是知识分子曾经以他们的情怀、境界、人格和学识，开启了一个时代；羞愧的是，那样的荣光不属于当代知识分子——尽管都是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没有那样的德性和智慧，这使得当代知识分子几不配称为知识分子。上个世纪民国时代钻山沟、泡农村、溜边疆的知识分子最终开启了时代，他们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领导人，他们开启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无论是中国国民党政府下的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下的革命，都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学术运动的变形和延续；上个世纪人民时代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三、四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平民教育”、“民众教育”、“新生活运动”之间不是断裂的，这两个不同政党形式下中国人的运动，都是同一个实质：教育，准确地说，大教育。教育，是由知识分子运动的，教育又运动着知识分子。

上个世纪人民时代钻山沟、泡农村、溜边疆的知识分子，还演绎着民国前辈知识分子的文脉，成为人民政府文化教育的主体。知识分子命中注定就是一个不得安宁的丐帮和运动员，或者像跑码头的跑马卖解走江湖的。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使知识分子的“丐帮”和“运动员”风采淋漓尽致地露了一手又一手。

当代知识分子生活得很没有味道，在生活之外寻找生活的味道，有一种沉重的轻松，没有家园、没有根基的轻松，仿佛失去了人的意义，颇像行尸走肉。根源在于知识分子不知道“我是谁？”“我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为名忙，为利忙，都把人忙死了。刚刚摆脱了清苦生活的当代知识分子，又沦落风尘，在沉沦一般的生活方式之中寻找着慰藉，用死掉的人和活着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理论、学说、话语、术语，甚至咒语，把自己从头发梢武装到牙齿，以掩盖自己本不应该空虚面目——当下坊间隆起各种各样的生意。我们把自己的灵魂，就交给了生意，生意人是时代的英雄，经济学是时代的思想家，舜若浮士德把

灵魂交给了魔鬼。知识分子已不会说话了，中国知识分子不会说中国话，尤其不会说自己的话，因为知识分子的灵魂已经典当、抵押了出去，换成了“科研成果”——那就是一篇一篇的论文，一部一部的专著，再把“科研成果”换成帽子、房子、票子、车子、面子，“五子登科”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新科举意义。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作为像义和团运动，博士硕士无疑是义和团师兄，博士硕士论文，当然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咒语。

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教育运动的道德精神施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和“农民运动”路子。

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的是“乡村建设”路子。

民国教育，走的是“乡村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的路子。

建国后的教学（教育）思想，是老解放区（山沟和农村）的教学（教育）思想。

文化大革命，是教育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乡村教育”的时代发展。

总之，中国革命，在满清政府完结以后，走向了乡村，这条路一直走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荒芜了起来，农民命运自生自灭起来。

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话题是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模式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国现代化并没有新思维，仍然是这个老套路，这和“中国特色”的理论相悖，就使得国家建设具有几分新洋务运动的性质。农村，在这种思维下，彻底边缘化了，中国的农业社会本质在这种尴尬之下越发凸显。

“农村包围城市”是“农村”或“农民运动”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就已经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海丰彭湃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共产党在瑞金、井冈山和延安革命，都是农民运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建国方略。

中国近代的“乡村”思想，滥觞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教育救国”。教育，是作为国家命运来对待的方略，这个教育的核心是“唤醒民众”，即教育民众，也就是使民众觉悟。

可以如是概括民国教育思想：社会建设，民族再造，文化复兴，教育救国。

社会建设的根本是乡村建设，因为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中国文明是农业文明。抓住乡村就抓住了社会根本，这个根本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中国社会在这个时代正遭遇着历史上最沉重的折磨：农耕文明的现代化。很难说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新道德，因为我们的农耕文明性质并没有被颠覆，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还是几千年以前的生活方式，农民的根本生活手段还是体力。道德是一种实践哲学，中国农民的体力劳动，既是生活手段，又是道德实践，这是最符合实践定义的哲学活动。^[1]那么，道德和道德教育就得在这样的生活逻辑上说话。

民族再造是恢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辉煌。民国时代，中国与东西方世界经历着曲折的遭遇，甚至有亡国之虞。所以，那时最大的现实是民族再造，实际上也就是恢复民族尊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儒学、科举制度和佛学，使中国成为东南亚的文化宗主国，即使今天，在东南亚的发达国家里，都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嗅到中国文化的

^[1] 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实践是“是人对于可因自身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的行动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之《译注者序》，商务印书馆，2003 年，xx。

息。当代，欧洲形成了共同体，古代，东南亚以中国为文化宗主国而形成了共同体。新时代的亚洲发展和中国发展，应该回复昔日的共同体文化圈。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宗主国，在人类的新时代，应当有更大的作为。

文化复兴是用中国文化复兴民族和国家，也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复兴民族和国家。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惟有中国这样流传下来，这正是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文化的实践，也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国家变革的尝试，带有理想国的意思。可能后现代文化思潮，使中国文化再次崛起有了一个机会，因为后现代思维走向了中国文化固有的直觉思维和超验思维。

教育救国实际上更是学术救国，思想救国，教育是作为国家、民族和文化意义上的思想，譬如，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寻找的道路就是教育中国人的道德实践；中国文化是教育文化，所以，“教育”是大概念，在毛泽东那里有着整个人类的思想和历史的意义，国家一次一次的运动，都是对人民的教育实践活动。当下的教育已经被窄化为仅仅是学校教育、甚至是班级学习的意思。教育和青少年学生以外的人了无教育关系，只有供养青少年上学的关系。

这四个方面就是中国的教育道德，或者教育精神。

这样的大教育思想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教育思想，与文化大革命这种教育思想相对应的一个活动，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工、学农、学兵。乡村，再一次成为教育的核心，革命的核心。知识分子，再一次成为革命的学生。另外一个重大教育实践活动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人民公社最开始是从农村实践起来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将来城市也要搞公社，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国家就组成一个大公社。人民公社是一个理想国色彩的社会教育实践，是人类历史上的绝特实践，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大概都不敢这样来实践。这不免使人想起梁漱溟先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是以“乡农学校”、“村学”和“乡学”为教育形式的，同时，“村学”和“乡学”也是社会结构。乡农学校的组成分子，就是全乡社会的人，其目的是要化社会为学校，可称之为“社会学校化”。它是以教为主，以政、养、卫副之，村学、乡学是以教统政，村学、乡学那样的组织代替了村、乡的行政职权。乡农学校是乡村建设的基础组织，也是乡村建设运动工作的基点，它的性质是用教育的精神来完成乡村建设的使命，以教、政、养、卫四方面来实践的。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走的“农村”道路，就是从知识分子那里学得的。在革命的早期，中国共产党走的是“城市”道路，并且乐此不疲，但是，革命实践说：此路不通！于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从陶行知先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先生的乡村教育、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等乡村运动中，悟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1]建国后，中国革命继续走在“乡村”的康庄大道上。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革命拐了一个弯，这个弯恐怕拐得不对，至少拐得太急了。

中国革命就是沿着知识分子的学术路子发展下来的。其中，教育和教育家是轴心，而毛泽东则是教育家中的教育家，他的群众思想是民众教育的贯彻。中国革命可以还原为教育运动，进一步说明中国文化是教育文化。

考察中国近代的文化教育，真正的路线是两条：一条是乡村建设运动，一条是学院思想。乡村建设运动以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俞庆棠、高践四、瞿菊农等为代表，这条线对学

^[1]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

术界有统摄作用。当时和后来的其他知识分子如吴文藻、费孝通、刘百川等人，都是在中国的田野进行研究，那样的研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费孝通在这方面成为集大成者。中国今天的建设，特别是乡村建设，费孝通的思想是直接的；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晏阳初的教育实践，不但是中国的经典，而且成为全人类的精神；学院思想则以蔡元培、胡适之、吴贻芳、陈鹤琴等为翘楚，科学、民主成为中国一百年不变的道德精神。即那时以教育研究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那时知识分子的教育筹划，最后成为中国革命的方向。那才叫学问与道德呢。

那个时代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走的都是教育之路，特别是地方知识分子，都以办教育为务，地方名流和道德楷模大率皆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精英，道德表率。

正是在那样的时代，长成了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奠定了文化教育之向往。知识分子也在那样的时代发生了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发生了一次文化上的分野，大陆、台湾、香港、海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田野。这四个田野的知识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历练着不同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从个人物质生活上说，大陆知识分子一言难尽，从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教育、政治诸意义上说，大陆知识分子群体才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这个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以科学技术为使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直接带来经济利益，在经济时代科技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红人”。这样，知识分子又发生了分野，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成为两个“专业概念”。科技知识分子由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边缘地位上升到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核心地位，人文知识分子则从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核心地位下降到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地位，这是意识形态的霸权已经让位给经济利益霸权的生动体现。相应地，教育思想也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思想转化为经济时代的人才思想，教育，成了“培养人才”，甚至，教育，只是培养人才。这里面包涵着值得疑问的现实：人才只是由学校来培养吗？在学校教育以外，不培养人才吗？学校，或者，教育能够完全培养人才吗？

今天所说的教育，是国家制度化的教育，不是自然化的教育，似乎也不是社会教育——既不是民国期间的社会教育，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教育。

在此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群体已经上升到很高的地位，然而，似乎没有这样一个势头：出现一个蔡元培、胡适之、陶行知、晏阳初那样的文化圣人或社会导师。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只像烟圈一样吞吐于知识分子的嘴上。这些年，学术届几乎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知识分子都炒了不止一遍，而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一个一个都被拎出来炒得发糊发焦，从他们身上榨出一桶一桶的油，拿回家炒菜、点灯、发动自己的摩托车、汽车和飞机。那些可怜的前辈似乎应该有比炒菜、点灯、发动摩托车、汽车、飞机更大的用处。不知道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若干年以后，后辈知识分子会有多少人把我们拿来又炒菜又点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又炒菜又点灯的价值；不知道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油水可榨取，也好为我们的后辈发动摩托车、汽车和飞机。

过去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体系之中，被知识分子要弄得有点像古代祭祀的刍狗，现代给死人烧的纸钱、扎的纸人、纸马、纸房子、纸轿车一类哄鬼的把戏。怎么理解这样的哄鬼文化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心里只有鬼，所以把神也都当成了鬼的缘故。

参考文献:

1. 毕世响,《教育史诗独白——国民社会教育体系诉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毕世响,《教育学:人民学术——教育的世俗与神圣》,《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3期。

It's Education that has Created Chinese Societ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Moral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Bi Shixia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As Chinese educ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ive enlightenment system, it is not necessarily to divide it into pieces such as moral education, intelligence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esthetical education and labor & technical education, etc. The systems of education and society are one and indivisible, society itself is also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al spirit and social spirit are enlightenment spirit, and enlightenment is for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contemporary education not only breaks up the own comprehensiveness of education itself, but also shifts the education object from the society and people to the adolescent in schools only, therefore, education is losing its natural morality, which is enlightenment. If we insist on adopting this analytical system of education to ponder educati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shall regain overall moral enlightenment. The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is the continuing moral practice, it is education that creates Chinese society, and vice versa. This is the moral education that backbones with soci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spirit, education spirit, social spirit, moral practice, mor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09-08-22

作者简介: 毕世响,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教育学博士, 教育学原理学科带头人。中国教育学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委员。